

從中國文化背景 看中文教學的特質(上)

楊 遠

文字是文學的細胞，文學又是文化的一環，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試先從文字談起。欲瞭解一國的文化，「必先考文識字，非切實瞭解其文字與文學，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內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欲論中國民族傳統文化：，莫如以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為之證。」①文字、文學與文化，確是「一體之兩面」②。

一、文字、文學與文化

中國文字是單音字，每字包括形、音、義三要素。因此而便於文學表達，特別是作詩。中國的詩歌特別發達也與此有關。中國文字是目前國際上使用人數最多，波及的地域最廣，以及綿延時間也最久的文字。「一考中國文字之發展史，其聰慧活潑自然而允貼，即是象徵中國全部文化之意味。」③

已故唐君毅師從哲學觀點從四方面分析中國字：

(一)、中國字的音與形都有意義。「因此要了解中國文字，一方面要了解它的音，一方面又要了解它的形。」④他舉「暮」字之例，「說文」云：「莫，日且冥也。」而莫、夢、悶、慕是雙聲，意義也相近。莫、勿、不、弗、沒，是疊韻字，意義亦相近。……中國文字之兼重形與聲以表義，使人易於兼顧到文字之直接的形與音律性，是更宜於文學的。

(二)、中國文字描繪形象，不只可由象形直接表示出，還可表示抽象義。如「然」字，「由狗在旁對著火之上肉，結構而成。而此結構，即將狗喜歡肉之意義表示出來。」⑤由此「然」字引申為一切「喜歡」或「贊成」以及「以為然」、「以為是」的意義。」⑥

(三)、「因中國之文字音、形皆表義，故中國地名與人名等皆有其意義，便可引起種種聯想與情意。……亦大都可以入文學。如唐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姑蘇原是地名，寒山是一僧名，……可引起種種聯想情意，便可入詩。」⑥

(四)、「中國文字之動詞，不用過去式、現在式與未來式，也不用主辭之人稱為多數、少數，以及主動被動等。……因此有人以為中國文字之意義不清楚。但實際上在文學的境界中，並不必須處處求清楚的。」⑦唐氏略舉數例說明：「譬如『論語』中的『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如要問此鳳是一鳳或二鳳？便只是一笑話。又如：『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人如一定要問：此送是過去送、現在送、正在送？亦是笑話。……李後主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此君是你呢？他呢？我呢？…我們根本就不當於此作分別。」⑧

以上唐氏略舉各例雖只典型詩文，惟可從中窺知中國文學與文化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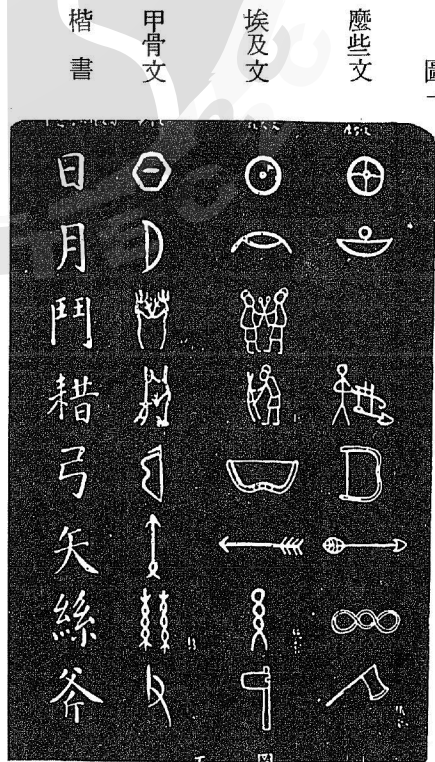
錢穆師認為中國文學有兩大特點：「一普遍性，指其感被之廣；二傳統性，言其持續之久。」⑨此當與秦代（西元前二二一—二〇七）統一中國後，「書同文」有關。錢氏列舉「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已是三千年前之詩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乃二千五百年前一聖人之訓誨。『北溟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此亦二千三百年前一哲人之寓言。『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又二千三百年前哲人之對話。……繙閱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語法同，明白如話，栩栩如活。」⑩此外，先秦的經、史、子等古籍中，尚頗多淺白易曉的文句與文章。

我們再來觀察中國最早的文字——商代（西元前一七六六—一一二二）的甲骨文。下面的圖片是我國甲骨文專家董作賓（一八九四—一九六三）於一九五六年三月間，在「港大」演講時所用幻燈片借用複製的。這套圖片是四種文字的比較：最左面是現在通行的楷書；第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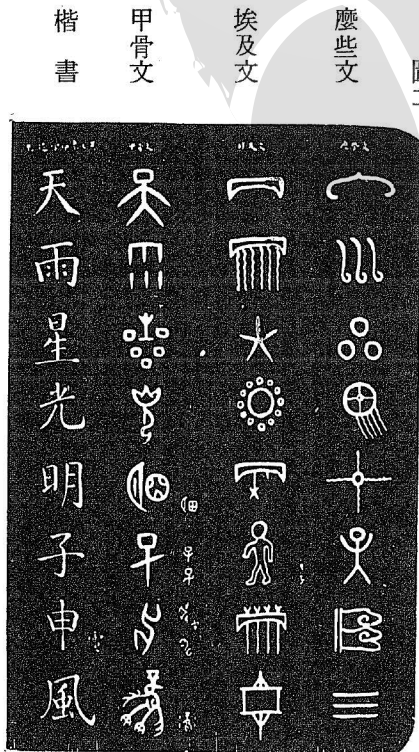
是甲骨文；第三行是埃及文；第四行是麼些（Mu-So）文。據董教授說，埃及文最早，約當西元前四千年至三千五百年，距今約五、六千年。甲骨文約當公元前一五八四至前一一二二，距今約三千五百多年。另據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國大陸在陝西西安市西南廿多公里的斗門鎮花園村曾發現距今約四千五百至五千多年的甲骨文，推前了一千至一千五百年，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文字。

⑪麼些文，是雲南西北黎江縣少數民族使用的文字，據說迄今尚通行。此文字的時間，約當南宋理宗時（在位：一二二五—一二六四），距今約七百六十多年。舉例如下：

圖一



圖二



楷書

甲骨文

埃及文

摩些文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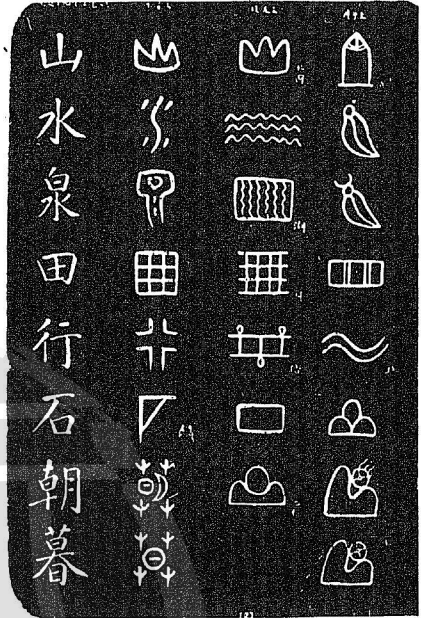
楷書

甲骨文

埃及人

摩些文

圖三



楷書

甲骨文

埃及文

摩些文

圖六



楷書

甲骨文

埃及文

摩些文

圖五



其中頗多文字與現今通行的楷書相近似。甲骨文雖是中國三千五百年以前的文字，但直到清末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才發現。其後從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起，始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進行有系統地發掘。迄今共獲甲骨文達十五萬多片，不同的單字共五千多個，能識者約兩千字。其字體的構造，已是單音獨體，符合「六書」的結構原則。以象形字最多，其次是指事和會意字，還有形聲、轉注及假借字，是成熟的文字。據董作賓教授說：「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文字，但並不是原始的文字。」從以上各圖片看，甲骨文同其他兩種文字最大的區別是：已由圖畫演變成文字！甲骨文已是直行書寫（如圖四），這一重大演變，據董教授說，至少要一千年。其中的「好」、「朝」、「暮」、「明」、「萬」等字是會意字。另從字的優美看，又有高度的藝術價值。其後中國的「字」同「畫」一樣可供欣賞。這也是世上所罕見的。至於埃及文、巴比倫文以及印度的梵文，早已不通行。由此可知中國文字與中國文化一樣能綿延至今仍不衰。

中國古代列為「經」。其後戰國時（西元前四五三—二二一）的「楚辭」可算為純文學性的作品，但嚴格來說，仍含政治意味。「屈原乃由政治動機而作『離騷』，故屈原作『離騷』之內心動機，實仍屬政治的，而非文學的。太史公『屈原列傳』發明其作意，可謂深切著明。」^⑫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總集，為南朝梁（西元五〇二—五五七）時蕭統（西元五〇一—五三一）所編的「昭明文選」，於「文選序」所云，其所選詩文的標準，凡經、史、子者皆不選，所選者為「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側重文學的思想和文采，即現代純文學所重視的要項。據近人考訂，「文選」約編撰於梁普通三至七年（五二二—五二六）。^⑬較中國第一部文學作品——「詩經」遲了一千六百多年。

指辭賦為「雕蟲篆刻（小技），壯夫不為。」（「法言·吾子」）甚至東漢班固（西元二—九二）「漢書·藝文志」將「小說家」不列入九流，稱小說家「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這還是緣於孔子所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論語·陽貨」）的觀念。從史學家觀點看，「道聽塗說」資料不可靠，故輕視小說。甚至先秦的荀子、莊子也都看不起小說，孔子指為「小道」是對修齊治平的「大道」而言。尤其中國先秦的聖哲都把眼光注視到治國的「大道」，如何將遼闊地面上的國家統一的問題，也就是先秦古籍上的「天下觀」。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中，不但看不起小說，更看不起戲劇。在「四庫提要」裡，就沒有劇本。藝人被重視，是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一）以後的事。

中國文字雖有以上特殊的優點，且極便於文學寫作，但中國文學在古代却無獨立的地位，並不被重視。

集部之始，另據清章學誠（一七三—一八〇四）考訂，「集文雖始於建安，（自註：「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而實盛於齊、梁之際。」^⑭然正式明確指出文學的標準，乃是「文選」。總之中國集部之萌芽與成長在東漢（西元二五—一二〇）末建安（一九六—二〇〇）至南朝齊（四七九—五〇二）、梁（五〇二—五五七）之間約三百多年。

「漢書·藝文志」雖有「詩賦略」，但只是選了「辭賦」和「詩歌」，其文學觀念並不明確。同時西漢（西元前二〇六—西元八）大辭賦家揚雄（西元前五八—一八）也看不起文學，

二、中國古代文學的性質

中國的文學產生最早，第一部文學總集「詩經」（西元前一一二—五七〇）約當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但「詩經」在

「漢書·藝文志」雖有「詩賦略」，但只是選了「辭賦」和「詩歌」，其文學觀念並不明確。同時西漢（西元前二〇六—西元八）大辭賦家揚雄（西元前五八—一八）也看不起文學，

「漢書·藝文志」雖有「詩賦略」，但只是選了「辭賦」和「詩歌」，其文學觀念並不明確。同時西漢（西元前二〇六—西元八）大辭賦家揚雄（西元前五八—一八）也看不起文學，

⑫

⑬

⑭

另一部最早的評詩專著，南朝齊鍾嶸（約四六八—五一八）的「詩品」，約成書於梁天監十二年（五一三），較「文心」約晚十年。

至於何以在這期間文學觀念如此興盛？似與這段時期玄學盛行，而儒學失去往昔控制學術力量有關。似也與佛教從西漢（西元前一〇六—西元八）末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一）傳入中國後，約於東漢末桓帝、靈帝時（一四七—一八九）始譯佛經，至南朝時（四二〇—五八九）譯經大盛也有密切關係。由於翻譯佛經而重視語法和文學。胡適認為翻譯佛經在中國文學上有重大的影響。⑯此處當注視的是劉勰譯佛經對「文心雕龍」的著作，以及對蕭統編「文選」的影響。前此，「左傳」襄公廿四年（西元前五四九）叔孫豹所說的三不朽的觀念——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的「立言」，雖並非指文學，乃是以思想為主，靠文學來傳播。其後孔子較明確地說出文學的功用：「言之無文，行而不遠。」⑰但叔孫豹、孔子的意見，似仍都是以文學為載道的工具。直到曹丕「典論·論文」首先明晰地說出文學的價值：「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⑱惟似仍帶有「載道」的意味。

總之，中國在兩漢以前，文學無獨立地位，乃為經、史、子的附庸。因此目前我們讀兩漢以前的文學多讀經、史、子書。

三、身教·士之責任

「身教」是中國古代教育中所特有的教學

法。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四七九）教學的四科，就以「德行」為首，其次是「言語」、「政事」和「文學」。（「論語·先進」）但孔子所說的「文學」和現代的「文學」涵義不同，乃側重學識。孔子教學時，就特別重視「身教」。他曾說：

「子欲無言！」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論語·陽貨」）

孔子是從天道講教育。「禮記·哀公問」：「孔子云：『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也即教育應順從自然演化之效。孔子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這雖是指從政而言，但也可引申到教育方面。中國後世的儒者多重視這種教育方式。如「荀子·儒效篇」所說的「人師」，「韓詩外傳」卷五申述得更明白：「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人師的行為可作為學習的典範。袁宏「後漢紀·靈帝紀上」，曾比較「經師」與「人師」：「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就強調「人師」的可貴。

不止儒家重視「身教」，道家也同樣重視。如老子所說的「不言之教」（「老子」第四十三章）甚至魏、晉，玄學盛行，儒學衰微時期，似尚未忽視「身教」，南朝宋劉義慶（四〇三—四四四）「世說新語」雖是反映魏、晉時代清談的思想生活，但此書的三十六門中，最先的四門，仍照孔子教學的四種，也以「德

行」為首。並於「德行」門第三十六條，記載東晉（三一七—四二〇）名臣謝安（三二〇—三八五）教子的故事。其夫人問謝安何以「不見君教兒？」謝安回答：「我常自教兒！」⑲即常施以「身教」。

南朝梁劉孝標（四六二—五二一）另舉了西晉（二六五—三一六）的劉子真（二二〇—三一〇）相同的教子故事，注云：「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受賂」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倣倣），豈嚴訓所變邪？』」據「晉書」本傳載，詳同。西晉劉子真也以「身教」教子，且其當代人還皆以為是。⑳此外「德行」門第一條載陳仲舉（蕃）「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第四條李元禮（膺）「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這兩條都是強調東漢時（西元二五—二二〇）士人的榜樣作用。在一般情況下，「身教」的效果會較「說教」為大。

儒家的教育，特別重視品德修養。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為學與做人」一文，認為求學的目的，「為的是學做人。」即使是學文、理、工、商等科，「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精通，你能夠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另一個問題。」㉑的確，一個人如果沒有良好的品德，他的學識越多，為害社會也越深。

漢武帝建元五年(西元前一三六)，春，把儒家學說定為一尊，「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漢書·武帝紀」贊)後，遂使儒家學說成為其後中國文教主流。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三「論孔教無可亡之理」曾說：

「孔教其所教者，人之何以為人；人群之何以為群也；國家之何以為國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也愈要。」

從現社會來看，物質文明越進步，德育越需要！梁氏接著說：

「近世大教育家，皆倡人格教育之論，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為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資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於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

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佔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預言也。」

儒家重視「德育」，對中國後世影響頗大。甚至唐代(六一八—九〇七)以後的文學家，多把他們的人格貫注於作品中，他們是從文學表現人生。這是中文教學時所不可忽視的。香港「教育署」已注視這點，並於一九八一年九月編印「學校德育指引」。此「指引」雖是建議性質，但對中小學「德育」教學，極有參考價值。它在簡要的理論以外，列舉了頗多具體的實例和教學法。目前新加坡也將儒家學說編入中學課程中。海峽兩岸的中國大陸似也重視尊師重道風尚。據今年三月廿六日北京電台記者

報導，今年教師節獎勵的教師約十萬人。^②台灣國民政府約於六十年代，已將「四書」編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在中學講授。目前對大專院校的倫理教育更為注視，並對師資的延聘特別著重品學兼顧。^③

一九六四年初夏，在「台大」任教近半個世紀英文的趙麗蓮教授，最後一課的「贈言」，曾再三勸勉學生，不要因「金錢」和「權勢」而忘掉她「平日教誨他們的道理」。^④一位從事英文教學的教授尚且注視到中國傳統的教學宗旨，實在難能可貴，深值教育界警惕！尤其是中文教師就更應以身作則。「德育」教學已是當前有助解決社會問題的重大課題。

註釋

- 註① 錢穆「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中國文學講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民國五三年(一九六四)，頁一。
- 註② 同上。可另參閱高明「論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中華文化問題之探索」，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六年(一九八七)。
- 註③ 同上，頁二。
- 註④ 唐君毅「中國文學與哲學」，香港「人生」第三二六期，民國五三年(一九六四)六月一日，頁二。可另參閱唐著「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第十一章「中國文學精神」，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八年(一九七九)。

註⑤ 同上。

註⑥ 同上，頁三。

註⑦ 同上。

註⑧ 同上。

註⑨ 同註①，頁二一。

註⑩ 同註①，頁一一二。

註⑪ 一九八五年五月，「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鎬京考古隊」在西安市西南二十多里的西安縣斗門鎮花園村，發現十五塊獸骨、獸牙和骨筭，經考訂，上面刻有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甲骨文。其時代「距今已四千五百至五千多年的歷史，恰與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相吻合。」(「瞭望周刊」海外版第二七期，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頁十四。)

註⑫ 同註①，頁二五。

註⑬ 何融「『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國文月刊」第七六期，民國三八年(一九四九)二月，頁二七。

註⑭ 章學誠著·葉瑛校註，「文史通義·詩教下」，北京「中華」，一九八五年，頁八〇，另見頁二九六—二九八「文集」篇。

註⑮ 日·戶田浩曉「文心雕龍」小史，「文心雕龍論文集」，註②引駱鴻凱「文選學·體式第四」(第一二四頁以下)，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三年，頁十一、十二及二七。

註⑯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章佛教的翻

譯文學，認為譯經文學在中國文學上最少有三項影響：一、對白話文的影響；二、對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三、對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的影響，上海「新月書店」，詳頁二〇二—二一五。按：另詳本文第五節「道家、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註⑰

「左傳」襄公廿五年（西元前五四八）卷三六引孔子語，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十三經注疏」刊本，頁一四〇。

註⑱

蕭統「昭明文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影印刊本，頁七二〇。

註⑲

劉義慶著，徐震堯校「世說新語校箋」，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二一。

註⑳

劉寔（實），字子眞。據「晉書·劉寔傳」云，寔兩子：躋、夏。寔兩次都因夏貪污坐免，未云及躋。「晉書」本傳：「寔少貧苦，……然好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坐免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且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

註㉑

，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

註㉒

詳見民國七八年（一九八九）三月廿七日香港「星島晚報」第七版。

註㉓

詳見同上四月十三日台灣「中央日報」第十二版。

註㉔

趙麗蓮教授的「贈言」，見民國七八年（一九八九）三月二日台灣「中央日報」第十六版。

中國哲學大綱

修訂本

羅 光 著
定價 二九七元

本書爲作者在羅馬傳信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十餘年的心得。將中國哲學的代表思想——儒、道、釋三家學者所發揮的各自的特點，按照邏輯推理法與每家思想之共同點結合，然後予以系統地撰寫而成。現經作者修訂，將原來上下兩冊擴充版面重新排印成一冊。全書分爲儒家、道家、佛教三編，附錄墨家、法家思想大綱及中國哲學家生卒年表。

中國哲學思想研究的方法與詮釋，一直爲學者所爭論，本書不僅清楚地表現出各家的本旨，更由各家的門徑中指出一條共通的方向——人生哲學。在現今各種思想雜陳之際，本書確能讓讀者有系統且清楚地了解中國哲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郵政編號：第 00000 號
電話：三三六八·三一六八·三一五五·三三八
傳真：(011) 3110117 四